

山东大学文史书系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郑欣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郑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 郑欣著 . —2 版.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2009. 4

ISBN 978-7-5607-0200-1

I. 魏…

II. 郑…

III. ①古代史 - 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K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646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10 毫米 1/16 24.75 印张 402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2009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定价: 49.6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魏蜀吴建国路线的比较研究	(1)
官渡之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12)
赤壁之战与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	(24)
孙权与东吴建国	(33)
司马懿和司马氏集团	(50)
三国史短论	(67)
何晏生年考辨	(8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宣佛小说	(91)
洛阳玄风与南朝文化	(100)
豆粥、韭花酱和牛驾飞车	(105)
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	(108)
唐寓之暴动的性质	(121)
门阀地主的形成、特点、作用及其崩溃	(130)
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	(154)
西晋的历史地位	(166)
曹魏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71)
曹魏士家制度的特点	(183)
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	(196)
魏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	(216)
魏晋时期北方门阀大族经济势力的扩张	(226)
东晋南朝时期的士族庄园制度	(240)

北朝均田制度散论	(257)
北魏均田令关于倍田的规定	(27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和户籍制度	(284)
淝水之战东晋获胜的经济原因	(308)
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	(324)
南朝的租调制度	(334)
南朝的杂调	(344)
南朝的徭役制度	(354)
北朝均田制度下的租调剥削	(371)
租调征收方法和“输籍定样”——与李燕捷先生商榷	(381)
后记	(389)

魏蜀吴建国路线的比较研究

《三国志·毛玠传》、《鲁肃传》、《诸葛亮传》分别载有毛玠给曹魏、鲁肃给东吴、诸葛亮给蜀汉制定的建国计划。这三个文件都是纲领、路线性质的大计，它们对指导魏、蜀、吴的建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魏的建国路线

初平三年(192)曹操占领兗州后，辟陈留平丘(今河南封丘县东)毛玠为治中从事。毛玠向曹操建议：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①

曹操十分同意毛玠的意见，所以就采纳了。注《通鉴》的胡三省评论毛玠这个建议说：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②。近人范文澜更认为毛玠说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两点，成了曹操一直奉行的两大方针。^③他们的论断都是很正确的。

① 《三国志》卷一二《毛玠传》。

② 《资治通鉴》卷六〇，献帝初平三年注。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8页。

拿毛玠这个建议,与鲁肃给孙权制定的“以图天下”的建国计划、诸葛亮给刘备制定的草庐对策相比较,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拥奉汉献帝,打着汉皇室的旗帜发号施令,建立政治上的优势,这是毛玠的建议所独有,而为鲁肃的计划和诸葛亮的对策所不可能具备的。(2)在鲁肃的计划和诸葛亮的对策中,都具体指出了应先消灭哪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哪个割据势力、先夺取哪个地区后夺取哪个地区的具体用兵步骤,但在毛玠的建议中却缺乏这些内容。这是因为在初平三年还是军阀混战的初期阶段,在混战的中心北方军阀众多,或据地而守,或流动作战,忽生忽灭,要具体指出应先消灭哪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哪个割据势力,既无这种可能,也无这种必要。北方的战略要地首推两汉的京都长安和洛阳,但它们都受到了董卓军队的严重破坏,人口稀少,荆棘丛生,暂时无占领价值。那时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乘机向周围发展的策略,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在这方面毛玠就无须多谈了。(3)在鲁肃的计划和诸葛亮的对策中未涉及经济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所占的荆、扬、益三州大体上未遭到战争的破坏,吃饭不成问题,因此无须谈经济问题。但在那时的北方因遭军阀混战的严重破坏,“生民废业,饥馑流亡”,能否解决粮食供应,成了解决每个军事集团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玠建议把“修耕植畜军资”定为曹魏集团应遵循的一大方针,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

曹操把这两大方针付诸实践是在建安元年(196)。这年春天曹操进军颍川许县,即在当地组织屯田生产,着手解决“修耕植畜军资”问题。屯田制度促使残破的北方经济渐趋恢复,解决了曹魏的军粮供应,从而为曹魏集团统一北方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由于曹魏屯田制度近人已多有论述,故本文不再重复。

建安元年春天,也就是曹操开始屯田的时期,一批汉室官员拥汉献帝由长安辗转逃回洛阳,时洛阳残破,他们的生活极度困难。曹操抓住这个机会,亲自率兵到洛阳,迁汉帝都许。从此曹操牢牢地控制了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了政治上的优势。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积极作用是什么?荀彧在给曹操分析奉迎汉献帝的好处时说:“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①奉迎汉献帝是否符合“民望”这里略而不论,至于荀彧说的“以服

^① 《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

雄杰”、“以致英俊”可说是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产生的两个主要作用。

先说“以服雄杰”。如在官渡之战前，关中地区以韩遂、马腾为首的十多支割据势力动向不明，如果他们出兵协助袁绍夹攻曹操，就会给曹军造成难以预料的险恶后果。建安二年（197），曹操派钟繇为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到那里稳定局势。由于钟繇有汉献帝这块招牌，所以经过他一番活动后，关中割据势力就明确表示弃袁向曹，并遣子入侍，使曹操免去了西顾之忧。在官渡之战相持时期，钟繇从关中调军马2000余匹到关中前线，对曹军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也是在官渡之战的前夕，袁绍派人与割据南阳的张绣联系，欲使张绣投袁反曹，但张绣的谋士贾诩最终却劝他投曹反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代表中央。由此可见曹操如果不是打着东汉皇帝的旗帜，在官渡之战中他能否打败袁绍还很难说。荆州刘琮的投降曹操和张绣大体相似，建安十三年（208）当曹操率大军兵临荆州，东曹掾傅巽劝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①可见刘琮所以降曹，一是因为自己的力量弱，二是因为曹操控制了汉献帝，代表中央势力。诸葛亮在《草庐对》中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可见曹操克敌制胜不单依靠武力，还靠“挟天子而令诸侯”这个法宝，许多割据之雄就是在这个法宝面前放下了手中武器，失去了抵抗能力。

再说“以致英俊”。这就是说曹操可以假借皇帝的名义来招揽人才。如王朗、华歆东汉末在江东做官，孙策占领江东后，他们都滞留南方未归，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表征之”^②，东吴才不得不放他们返回北方，后来他二人都成为曹魏的栋梁之臣。当时也有不少人看到曹操代表中央而主动归附曹魏阵营的。如赵俨、繁钦流落荆州，当听到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俨谓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也，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遂扶老弱归太祖（曹操），太祖以为朗陵长”^③。流落长沙的杜袭，听到“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④。由此可见皇帝这块招牌对笼络士子、收揽人才还是起很大作用的。

当袁绍刚占领冀州时，沮授曾给他谋划：“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

^①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② 《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华歆传》。

^③ 《三国志》卷二三《赵俨传》。

^④ 《三国志》卷二三《杜袭传》。

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①后来沮授又劝袁绍：“宜迎大驾安官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②但郭图、淳于琼不同意沮授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③袁绍听从郭图、淳于琼的意见，拒绝了沮授的控制汉献帝的计划。当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打着东汉中央的旗帜号令四方，“收河南地，关中皆附”^④，袁绍才后悔不迭，认识到未迎汉献帝为失策，但这时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局面已经无法动摇了。这也足以证明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

毛玠向曹操建议的两点，高瞻远瞩，捉住了要害，对曹魏政权的建立和统一北方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毛玠的建议是否有缺点呢？有的。仔细推敲“奉天子以令不臣”这句话，奉者拥戴也。即拥戴汉献帝削平“不臣”的群雄，重整汉室江山。这就有问题了。东汉晚期政治昏暗，魔怪起舞，这样的王朝怎能恢复呢，即使能暂时复辟它也断难持久。精明的曹操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所以他就把“奉天子以令不臣”改造成“挟天子而令诸侯”，即把汉献帝完全作为一种工具来为创建曹魏政权服务。曹魏的政治较东汉晚期的政治要清明一些，人民的生活要好一些，所以曹操利用“挟天子而令诸侯”来创建曹魏政权虽然是谋私利，但也具有进步意义。

二、吴的建国路线

兴平元年（194），当孙策要向江东发展的前夕，张纮给孙策制定了一套策略。史称：

今君绍先侯（孙坚）之规，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⑤

①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②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③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④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⑤ 《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注引《吴历》。

引文中说的“投丹阳，收兵吴会”，就是说占领长江下游的扬州；“则荆、扬可一”，就是说以扬州为根基进占长江中游的荆州。占领荆、扬后，就可以“据长江”，进而扫灭群雄，辅佐汉室，建立与历史上齐桓公、晋文公相媲美的霸业。但可惜孙策在占领扬州后就死去了，未能完成张纮给他定的策略。

建安五年（200），孙权继任吴主后，他向鲁肃请教，鲁肃给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应采取的策略。《三国志·鲁肃传》称：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

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据鲁肃所对，要点有以下四个方面：（1）挟持汉献帝的曹操势力强大，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能很快除掉，要想建立“桓、文之功”是不可能了。现在只有立脚江东，伺机发展。江东虽然狭小，但也无妨，因为北方“多务”，那里的割据势力无暇南顾，正好抓住这个时机迅速发展。（2）发展的第一步是，剿除江夏的黄祖和襄阳的刘表，占据长江中游的荆州。（3）发展的第二步是“竟长江所极”，就是进窥长江上游，消灭益州的刘璋。（4）据有长江以南的土地后建国称帝，与北方的曹操相对抗，徐图天下。

鲁肃给孙权的谋划，受到张纮给孙策谋划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它较张纮的谋划有重大的发展也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统一全国，但张纮要孙策依旧打着汉室旗号，建立犹如桓、文那样的霸业。鲁肃则是要孙权自己称帝。当张纮给孙策谋划时，孙策的势力还很小，就全国来说还没有一支割据势力宣布废汉称帝。当鲁肃给孙权谋划时，孙权事实上已是江东的土皇帝，就全国来说，既有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于前，又有袁术称帝于后，“汉室不可复兴”，已是不难看到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鲁肃要孙权相机称帝，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二，在张纮给孙权谋划时，北方曹操、袁绍、袁术、吕布等强敌林立，羽毛未丰的孙策当然不宜在此发展。益州偏远闭塞，对孙策来说鞭长莫及，暂时无力量

也无必要去占领它。只有扬州空虚，而占扬又必得占荆，只有荆、扬一体才会有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张纮要孙策先混一荆、扬，再参与中原逐鹿。但东吴要和谁争天下，当时还看不出来。当鲁肃给孙权谋划时，曹操已战胜吕布、袁术、袁绍等群雄，成为全国谁也难以扳倒的最大割据势力，他统一北方仅是时间问题。而这时江夏黄祖、襄阳刘表、益州刘璋，已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能面目。所以鲁肃要孙权先夺取江夏、荆州，再进取益州，等占领整个长江流域后，再与北方的曹操争高低。应该说，争取这种局面，是当时东吴能争取到的最佳结局。

总之，鲁肃的谋划较之张纮的谋划要细致一些，眼光更为远大。但它的执行情况却未能尽如人意。

鲁肃向孙权建策是在建安五年（200），经过七八年时间，到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在黄祖降将甘宁的推动下，才大举出兵击灭黄祖。鲁肃的计划为什么长久未能实施，是孙权不重视他的谋略吗？不是的。原因是东吴内部不稳，而主要是山越力量的牵制。山越是散布在江南广大山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人数众多，不向官府服役纳税。东吴为了扩大兵源税源，对山越采取强硬的围剿政策，被围剿出的山越人民，强者为兵，弱者补户，成了为东吴政府服役纳税的对象。东吴政府的这种蛮横政策，引起了山越人民长期的坚决反抗。陆逊曾对孙权说：“山越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①因此，在鲁肃向孙权建策以后的七八年时间，东吴根本腾不出手来向黄祖用兵。建安八年（203），孙权虽一度向黄祖用兵，但因受到山越的牵制，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而不得不草草收兵。直到建安十一年（206）以后，孙权围剿山越初步告一段落，才在建安十二、十三年两次进伐黄祖，消灭了黄祖的势力，才算完成鲁肃给他所定用兵计划的第一个步骤的一半。

当鲁肃给孙权谋划时，他只看到“北方诚多务也”，但却没有看到东吴本身也正处在多事之秋，这说明鲁肃对江南的民族问题既缺乏清醒认识，也缺乏对付的良策。如果鲁肃能给孙权制定一个对付山越的适当政策，东吴大概不会用那么多的兵力和时间来解决山越问题，从而延缓了它统一江南的进程，也使它丧失了占领益州的机会。这说明鲁肃的谋划是不周全的，是有缺陷的。但不管怎样说，东吴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最终占领荆州，孙权在太和三年（229）称帝，也都是依

^① 《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

照鲁肃的建国计划进行的，所以鲁肃仍不失为三国时期一位第一流的谋略家。

三、蜀的建国路线

建安十二年(207)，刘备见诸葛亮，向他请教建国大计。诸葛亮给他说了一席话，这就是著名的《草庐对》：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

草庐对策的要点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曹操占有中原，孙权据有江东，势力都很强大，暂时不能向那里发展。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昏庸无能，内部不稳，应夺取这两个地区作为立足的根据地。(2)“跨有荆、益”后，要“内修政理”，同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开发西南地区，增强势力，做好进行统一战争的准备。(3)“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力量最强，是主要的敌人。孙吴“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一时也消灭不了它，必须“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4)在准备好的基础上，分两路进行北伐：一路由荆州出宛、洛，一路由益州出秦川，两路夹攻曹操，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

拿草庐对策与鲁肃给孙权制定的建国计划相比较，占有荆、益是双方都具有的，而且鲁肃提出占有荆、益要比诸葛亮早七年。这说明，刘表保不住荆州，刘璋保不住益州，乃是天下才智之士的共识，并非诸葛亮的创见。

^① 《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被王夫之誉为“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①的孙刘联盟，只见于草庐对策，不见于鲁肃的建国计划。鲁肃给孙权谋划是在建安五年(200)，这时曹操还在北方转战，无南下的迹象，当然不会产生抗曹和联合的问题。但到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当鲁肃前往吊祭刘表时，就向孙权提出了孙刘联合抗曹的建议。鲁肃在当阳长坂见到刘备和诸葛亮时，也向他们提出了联合问题。赤壁之战以后，孙权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又同意鲁肃的意见把江陵借给刘备，这都是为了加强吴蜀联盟。这说明孙刘联合抗曹，也是吴蜀两国才智之士的共识。但诸葛亮在草庐对策中阐述孙刘联盟是在建安十二年(207)，要比鲁肃建议孙刘联盟早一年，那时曹操的军队尚未南下荆州，这说明诸葛亮的政治眼光要更机敏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上面说过，在鲁肃的计划中完全忽略了江南地区严重存在的民族问题，未能制定出对付山越的良策，从而延缓了东吴统一江南的进程；但在草庐对策中诸葛亮却注意到了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预先制定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蜀汉处理棘手的民族问题比较顺利、成功，是和诸葛亮早已定下正确的方针路线有关系的。这一点，也说明诸葛亮比鲁肃要高明一些。

《草庐对》是严密的，但它也有疏漏之处，“跨有荆、益”^②就有问题。荆州和益州在地理上虽相毗连，但益州四面被高山环绕，陆路难以通行，两州交往多靠长江水道。由荆州的夷陵(今宜昌)到益州的江州(今重庆)，江道全长 1181.4 华里，两岸皆山，故称“峡江”。峡水湍急，漩滩暗礁，所在多有。特别是由夷陵到夔门长 386 华里的长江三峡，两岸壁立千仞，航行更难。行船季节，以旧历二、三、四、九、十、十一六个月因水流较为平缓，航行较易，其他时期都不宜行船。古人描述峡江交通艰难的情况说：“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③这说明荆、益之间要大规模运兵运粮是困难的。交通如此困难，造成荆、益两州基本上是隔绝的，要在这两州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当然难以维持。

这需要从刘备占领荆、益的历史进行考察。

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又从孙权那里借到

^① 《读通鉴论》卷九《献帝》第二十六论。

^② 最先指出“跨有荆、益”为不可能的是傅克辉的《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一文，载《文史哲》1986 年第 3 期。

^③ 陆机：《辨亡论》。

江陵，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他从接收刘表旧部和地方势力，力量空前壮大起来，与曹魏、东吴初步形成了鼎立的局面。刘备力量的壮大，还为他进一步占领益州奠定了基础。这都说明《草庐对》建议刘备先占领荆州的策略是正确的。

促成刘备入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荆州的形势有关系。荆州是富庶之地，也是四战之地，曹、孙、刘都想占有它。在赤壁之战中，曹、刘、孙三家为瓜分荆州曾演出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斗争中刘备侥幸地占了上风。这场斗争肯定还会继续下去，但势力较弱的刘备集团要想再占上风就困难了，它很可能会一败涂地。为求万全之策，它向邻近的益州发展是必然的。诸葛亮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①，道出了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有向益州发展才能摆脱这个困境。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兵数万人入蜀。十九年(214)，诸葛亮、张飞、赵云又带兵入川，对刘备进行增援。成都被攻破，刘备集团占领益州，使它立于不败之地。

刘备、诸葛亮入川后，留关羽守荆州。刘备集团的军队分两批调入益州，留给关羽的兵力就十分单薄了，与魏、吴相比更居于劣势。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兵攻曹魏据守的襄樊，后方空虚，被吴将吕蒙偷袭荆州，关羽全军覆没。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打响，到这年十二月才结束，前后经过五个多月，时间不能算短，但刘备却始终没有向关羽增援一兵一卒。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主要是因荆益之间交通太困难了，要增援谈何容易！事实证明《草庐对》要求刘备集团长期“跨有荆、益”是失策的。

“跨有荆、益”虽是失误，这并不是说刘备集团占领荆州、进军益州是错误的，它占荆和占益都是对的。问题是它占领益州后，就该主动退出荆州，这样才能避免损失。《草庐对》虽有此失误，但它提出的联吴抗曹、先后占领荆益、和戎抚夷等无疑都是正确的。蜀汉政权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大体正确的路线建立起来的。

四、三方建国路线执行情况比较

魏蜀吴三国建国路线的执行情况，大体来说蜀不如吴，吴不如魏。

^① 《三国志》卷三七《法正传》。

上面说过,毛玠给曹操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最终要复辟东汉政权,这是行不通的。曹操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把它变成“挟天子而令诸侯”,来为创建曹魏政权服务。这样就变“行不通”为“行得通”。毛玠建议的“修耕植畜军资”,并没说采取何种形式来“修耕植”,曹操却采用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屯田制度来组织生产,从而取得了“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①的满意效果。任何计划都很难没有缺失,要避免失误,就得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对计划进行修改、补充。曹操正是通过对毛玠的计划进行改造、补充才取得好效果的。

鲁肃提出东吴立国计划后,经过八年孙权才消灭江夏黄祖,完成计划的一小步。行动如此缓慢,说明它实施的情况不佳。赤壁之战前夕,鲁肃又提出联刘抗曹策略,从而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战后的初期,曹操对孙、刘的威胁还很严重。鲁肃劝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给刘备,以增强孙刘联合抗曹的力量。曹操见荆州无机可乘,才把主要军力调向西北,以安定后方。联刘抗曹、借荆州两策,可说是鲁肃对他提出的建国计划的必要补充。刘备入川后,孙权在讨回荆州未果的情况下,才在襄樊之战时期偷袭江陵,占领荆州,实现了鲁肃计划的第一步。按鲁肃的计划,还要占领益州。但当刘备据有荆州后,阻塞了东吴通向益州的道路,他再想占益州就难于上青天了,孙权只有放弃占领益州的计划。这种放弃是明智的,如果孙权硬要向益州用兵,必然给他带来巨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东吴执行立国计划的情况还算差可人意。

掌蜀汉大权的刘备,在执行《草庐对》的初期还是顺利的。但当他占领益州后,形势要求他纠正《草庐对》的失误,主动放弃荆州,但他却没有放弃。应该指出,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放弃一块土地是必要的。如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结果不仅迫使曹操放缓了对荆州的争夺,还为东吴最终把蜀汉势力逐出荆州创造了条件;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主动放弃汉中,效果也是好的,这使大量曹军避免了被歼灭的命运,保存了曹魏的实力。但刘备却看不清形势,不愿放弃荆州,结果不仅荆州丢失了,还把关羽率领的几万官兵也搭了进去。当刘备要发动夷陵之战欲收回荆州时,诸葛亮、赵云、秦宓等都持反对态度,这说明至迟在这时他们已清楚“据有荆、益”是不可能的,应该放弃荆州。但刘备仍一意孤行,悍然发动了夷陵之战。结果刘备被东吴打得大败,他率领的4万多军队全

^①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部被消灭，使蜀汉又遭受一次巨大损失。刘备死去，诸葛亮接掌蜀汉大权，他才可能用行动对草庐对策中的失误进行修改、补正。荆州被彻底放弃了，吴蜀联盟又恢复正常。他还对南中的少数民族执行恰当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并促使西南地区渐趋开发。由于荆州丢失，两路北伐是无法实现了，他只能进行一路北伐。在《草庐对》中，诸葛亮对北伐是认真的，他想通过北伐来扫平曹魏。但到他组织北伐时，已经知道要打倒曹魏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北伐变成以攻为守的行动、自救的行动。不少人对诸葛亮的北伐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徒然增加蜀国人民的负担，但我认为诸葛亮如果不北伐，蜀汉未必能支持那么多年。

政策、计划执行得好坏，与主要掌权人的能力和水平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从能力和水平来说，曹操最高，孙权次之，刘备最差。所以，魏蜀吴三国立国路线的执行效果，就蜀不如吴，吴不如魏。但就魏蜀吴三国立国路线的谋略水平来说，却要反过来：诸葛亮第一，鲁肃第二，毛玠第三。

官渡之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一、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

东汉末年割据混战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汉中叶以来士族豪强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膨胀的结果。

自汉武帝推行尊儒政策以后,儒家被抬到了凌驾于各学派之上的“独尊”地位。国家通过察举、征辟选用的官吏,大多是尊孔读经和标榜仁、义、孝、悌等礼法的儒生。有不少地主富室,依仗他们雄厚的经济力量,打着世代传习儒家经籍、礼法的招牌,左右舆论,弄虚作假,而能够累世做官。这种现象,东汉以后越来越明显。弘农杨家四世为太尉,汝南袁家四世有五人官至三公,便是明显的例证。可以说,东汉一代国家的各级官吏多数都是从这些儒学门阀中选拔出来的。这样,在社会上就逐渐形成了印着儒家标记的封建世袭贵族——士族地主阶层。

士族地主凭借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特权,在社会上网罗门生、故吏,结党营私。他们到处伸张手脚,争权夺利,而特别着重抓地方州郡的权力。从西汉中晚期以后,州刺史和郡太守的权力一直在加强,到东汉末年,州郡不仅有民政权,而且掌握了领兵权——所谓“内亲民事,外领兵马”^①。这样,当士族地主出任地方州郡长官以后,自然就把州郡变成了他们的私人王国。所以,到东汉后期,地方州郡实际上已处于半割据的状态。中央指挥不灵,形成了“州县符,如霹雳;得诏

^① 《资治通鉴》卷八一,西晋太康元年。